

只要有环境考古的著作出版,我都十分高兴。任小林的著作《中原地区史前时代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即将出版,约我为其写段文字,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与人类历史相伴,人类对这种相互作用的探究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关于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涉及很多学科。对现代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研究,主要有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学科。对历史时期的研究,历史地理学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对于史前时期,则主要依赖于环境考古学的研究。

国际上环境考古研究的历史大致同史前考古学的形成相伴。19世纪中期是史前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欧洲的一些考古发掘,就开始了人类文化同环境背景关系的研究。20世纪早期,欧洲、美洲、近东和中亚地区的一些考古工作也涉及了环境考古相关问题的研究。20世纪中期,受自然科学中生态学发展的影响,文化生态学、功能-过程考古学等学术思潮的兴起,考古学已不再满足于对历史的重建,而强调探寻人类文化特征形成与变迁的原因与动力机制。并认为人类行为对环境的适应是文化特征形成和变迁的主要动因,环境考古学的重要性因此而得到大幅提升。

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诞生有一百余年的历史。早期的一些主要开拓者,安特生、袁复礼、德日进、杨钟健、李济、梁思永、裴文中等,将考古学研究与古环境研究结合,产生了中国考古学发展早期第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仰韶、周口店、萨拉乌苏、西阴村、殷墟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都结合了地质地层、石器岩性、地貌与水文环境、动植物与气候等多方面因素的古环境研究,书写了中国考古学发展早期环境考古研究的亮丽篇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快速发展。受国际科学发展趋势影响,环境考古研究迎来了新的快速发展时期。许多著名考古学家和地球科学家提倡并开展了一些与环境考古学家的研究与著述。一大批考古学工作者和地球科学工作者合作,将考古学发掘研究与古环境研究结合,产生了一大批高水平成果。

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文明古国,人类活动遗存最为丰富。中国的自然环境类型和演变历史也极为复杂多样。中国的考古学和地球科学都具有良好基础,已具备较高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中国的考古学和地球科学工作密切配合,充分利用中国的独特资源优势,深入开展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研究,必将取得令国际学术界瞩目的成就。

任小林曾在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攻读史学方面的本科和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从事环境史方面的研究,与环境考古有一定关联。到北京大学攻读环境考古方向的博士学位,大力补充了他在地球科学方面的学术基础。期间,任小林曾赴美师国际著名地学考古学家T.R.Kidder学习。博士后期间,他到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在郭正堂院士指导下,进一步夯实了地球科学方面的功底。小林聪明好学,获取知识的能力和记忆力超强,善于将不同学科方向的内容融会贯通,具备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有利条件。他在野外工作和实验室工作中都很能吃苦,善于克服各种困难获取扎实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出色成绩,可喜可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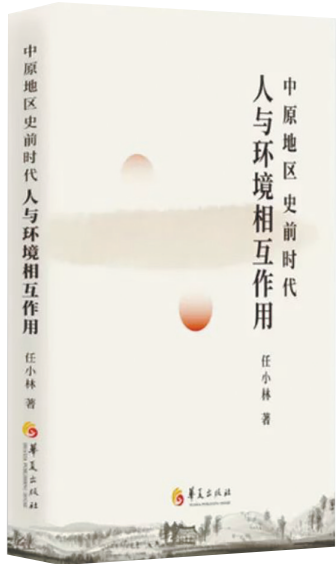
中原地区拥有百万年以上的人类活动历史和发达的旧石器文化。旧石器过渡期和新石器文化持续发展,高度发达,对全国产生了推动作用。中原地区是我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核心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中原地区的人类文化在起源与发展进程中,表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广域适应性、顽强的持续发展生命力等优秀特质。中原地区诸多人类文化的优秀特征、人类文化的持续发展、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独特作用等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如何?存在或发生了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这些必然还是我国人类文明史、自然环境史,以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等领域永恒的重大课题。

本书在中原这个宏大的地域范围内,选取不同空间范围和不同时间尺度的自然环境及其演变同人类发展相互关系为研究课题,通过获取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试图揭示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一般性规律。本书只有中国早期农业的地貌背景一章远超出了中原地域范围,所选取的四个研究案例都涉及了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领域。

国际上关于农业起源的过程、动力机制、起源地域、起源与环境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为热门和前沿课题,至少已持续有半个世纪之久,已成为经典的理论也在十个以上。然而关于上述基本问题的揭示仍未取得共识,已成为经典的理论也各持一说。如与天然食物资源多寡相关的有中心地论、边缘地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有绿洲理论、环境压力论。与起源地地貌环境相关的有山地说、山麓地带说、河谷地带说、大陆架说等等。西亚是麦类农业和牛羊等动物驯化最早的地区,也是世界上农业起源研究最多的地区。该地区的动植物驯化和早期农业畜牧业起源于“新月形沃

中国环境考古学佳作

《中原地区史前时代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序 莫多闻



地”,而大多数早期遗址分布于山麓地带。本书对中国已发现的早期农业遗址进行了空间分布统计,发现北方地区主要分布于山麓地带的土质台地或低缓土质丘陵之上。而南方早期稻作农业遗址主要分布于山间谷地或山前平原地区。中国的农业起源研究仍然需要关注这些地区。

人类发展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问题是许多人与地关系有关的学科讨论的热点,其研究和探讨的历史远比环境考古的历史久远。本书的“中原地区全新世植被、人口和社会适应”一章主要依据孢粉分析关于植被和气候变化历史的重建,以及根据考古遗址碳十四年代数据的人口变化模拟,讨论人类对气候环境的适应问题。当然属于环境考古研究的范畴。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习惯上,中原地区包括关中和晋南等地,本章碳十四年代数据获取的区域只包括中原地区的中东部,因此有关分析和结论也与中原中东部地区相适应。本书所使用获取孢粉记录的钻孔剖面位于郑州东部地势相对较低和水分条件较好的地点,全新世期间植被特征对于气候的响应可能受到低湿生境特点的影响。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在讨论气候变化历史时,充分结合了区域内或邻近地区的气候记录。区域人口的波动与气候温暖湿润的波动呈正相关的结论是合理的。而青铜时期灌木草本植物比例大幅增加,明显超出了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人口又有较大幅度增长。本书指出该时期农业技术和社会组织的显著进步,导致在气候干凉化背景下社会人口反而明显增加,人类活动的增强对该地区植被衰退产生了重要影响。

河流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早已为学界和公众所熟知。然而,以流域为对象,深入研究和揭示流域自然环境及其变化同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还是近年来在国际上受到重视而有所开展的课题。双洎河是郑州南部的一条小河,属于淮河的三级支流。然而这条小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流域内从旧石器到历史时期的遗址密集分布。其中李家沟遗址是黄河流域已经发掘研究的旧石器过渡期最早的新石器遗址。裴李岗遗址是影响范围超出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的命名遗址,该遗址近年来又发掘出丰富的旧石器晚期遗存。古城寨遗址残存城墙高度16.8米,是全国龙山时期城墙保存最完整的遗址。新寨遗址被认为是夏朝早期的都邑性城址。望京楼遗址是夏代至战国时期的中心城址。本书根据大量河谷剖面研究,多个重点剖面的年代测定和多种古环境指标的分析,系统重建了流域地貌、水文环境、植被面貌和气候变化历史,据此分析了流域内文化演变、聚落分布、社会经济变化等同自然环境的特征及其演变的关系,是流域环境考古研究的重要案例。稍显不足是人类文化同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讨论未能充分展开,期望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深入。

早期城邑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进程和社会面貌。城邑被认为是人类历史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因此,国际上多以“城市革命”来表征文明起源这一重要历史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生了由主要关注物质文化遗存和文化谱系研究,向关注社会面貌和聚落研究的重大转变,催生了早期城邑研究的热潮。古城兴废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也已取得较多成果。然而,早期城邑发展对环境影响的研究还不多。国际上的研究发现了两种不同的影响,其一是城邑兴建和使用破坏了环境,其二是城邑先民采取的保护环境的措施使环境得到改善。郑州及邻近地区,是中国早期城邑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对于研究早期城邑对环境的影响具有典型意义。本书以郑州东赵遗址为研究重点。东赵遗址包含了新寨时期的小城、二里头文化二期和三期的中城,以及东周时期的大城等三期古城。作者通过古城三个典型城壕沉积剖面沉积样品的年代、孢粉及多种古环境指标的分析,重建了古城兴建、使用和废弃时期的植被面貌和气候特征。作者发现,植被的变化除与气候变化相关外,古城兴建和使用过程对附近植被衰退产生了明显影响,说明当时人们还缺少主动保护环境的认识和措施。

本书围绕多个重大科学问题获取了充足的研究资料,许多分析和论证也值得称道。任小林作为一位年轻学者,为中国环境考古学发展贡献了一本佳作。值得庆贺。

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既是具体的科学研究,也关联着终极哲学追问;既是学术探索,也是现实考量;既历史悠久,也会历久弥新。中国从事这方面研究,既有独特有利的客观条件,又有雄厚的学科基础。由于国力的增强,社会的重视,中国的环境考古研究正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期望广大年轻学者,不负时代,奋力拼搏,尽早让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环境考古学雄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中原地区史前时代人与环境相互作用》

作者:任小林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周杨在本科三年级时,来找我指导学年论文,他说对音乐和丝绸之路有兴趣。我建议他先选择丝绸之路上最具代表性的乐器,用传统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进行梳理。随后,他写出了《敦煌莫高窟所见琵琶图像的初步研究》,从此开始了他对古代音乐和乐器的研究。

我一向主张做研究要从兴趣出发,这样会有动力,有激情,能长久。可是音乐史的研究已经成果斐然,其中的音乐考古也不是全新领域,如何突破?如何深入?可见的现象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往的研究通常是从文献到文献,运用考古资料不多,也不充分。如果以考古发现特别是新发现的音乐类文物为切入点,定会有所收获。然而在考古学领域,音乐考古是边缘,涉足的人不多。我们认为,音乐考古并非边角碎料,反而十分重要,因为音乐贯穿人的生老病死,陪伴人的一生,也贯穿于政治、社会、娱乐与人心等方面面,能揭示人性、礼俗、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恰好提供了此前不曾有的观察角度。

撰写大学本科的学年论文,要学会收集、梳理资料,算是基础训练。毕业论文则要求更高,不仅要面对更多的资料和信息,还要提出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其过程枯燥而烦琐,要有极大的热情和孜孜不倦的精神,周杨做到了。他收罗积累了大量资料,完成了学士学位论文《隋唐时期北方地区墓葬乐舞图像研究》。文中不仅观察到乐舞组合形式的时代变化,更敏锐地注意到隋唐之际、高宗武周时期、玄宗时期等几个关系到隋唐时期音乐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还发现音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常以地域、礼俗和文化传统为动力。这篇论文后来经过修改,以《无声胜有声》为名刊出(见《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礼俗与礼仪制度学术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那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而本书的书名也正是由此而来。

我曾问他完成学士学位论文的感受如何,他只是略带羞涩地说:“我的耳边会时不时响起那些我未听过的声音。”简短的回答,表明他已经由“兴趣”进入“境界”,定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果然,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隋唐时期琵琶研究》,延续、加深了本科学年

前不久,在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中轴线众多遗产点中,北京太庙作为明清两代皇家祖庙,是中国祖先崇拜文化传统的物质载体,是最重要的国家礼制建筑,也是我国现存唯一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祭祀建筑群,拥有完整的格局、辉煌的建筑、精美的艺术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堪称古典园林之瑰宝。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研究室原主任贾福林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华礼乐文化的研究和传承,他的新作《太庙与中轴线古建筑文化经典:北京太庙中轴线重要地位研究》,是近年来不多见的深入研究、解读太庙与中轴线重要关系的图书。全书紧扣中轴线文化探索、北京传统都城文化等热点,系统研究了中华太庙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地区宗庙和太庙的历史与现状,诠释了太庙在中轴线中遗存中的重要地位,阐明了太庙在新时代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

作者在书中阐释道:北京的中轴线起源于元大都,精确而艺术地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化最为核心的知识与思想体系,具有罕见的文化和自然价值,它超越了国家界限,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坐落于中轴线核心位置

《无声胜有声:中古中国墓葬音乐文物与礼乐文化》序

齐东方

论文,运用的资料不仅有石窟寺壁画,还补充了乐器实物、墓葬壁画、葬具图像、陶俑和器物装饰等多方面的内容,像是“十面埋伏”后的一次冲锋,在解决乐器形制变化和传播演变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将其纳入文化史和政治史的视野下来观察,与本科论文相比是个飞跃。抛开论文内容,记得我在阅读初稿时,仿佛我在文字中听到了琵琶曲《十面埋伏》中那俄而无声、徐而察之、起伏不定、波澜不惊的声音。我走神了,并被感动,正如他早年所说“我的耳边会时不时响起那些我并未听过的声音”。

周杨的研究,没有“十面埋伏”后陷入“四面楚歌”。从学年论文的基础训练,到本科论文的个案探索,再到硕士论文的综合研究,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突破,使我对他后续的博士论文又多了几分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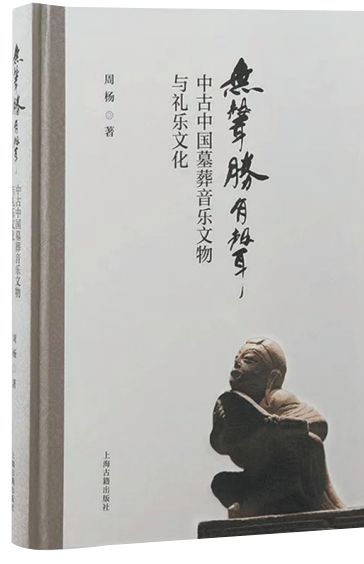
音乐,有的和谐悦耳,有的杂乱无章,有的充斥着愤怒与躁动,有的显示出浴血奋战。写有关音乐的学术文章,过程也如同音乐,背后有枯燥、快乐、沮丧、兴奋,人生的情感大都能体验。

从事古代音乐研究,光有兴趣不行,还要有特殊的知识结构。好在周杨喜欢音乐,还下功夫学习了乐器和音乐学等相关知识,甚至还有实践的经验。本以进入博士阶段,有些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然而,他博士入学后突然说,想换一个题目试试,转向十六国时期墓葬的研究。我不知道是兴趣的转移还是畏难情绪的影响,但还是支持他按照个人的意愿进行。而在这时,他出现家庭变故,有了一系列的个人遭遇,突然要承受巨大的生活和精神压力。令人欣慰的是,他没有倒下或走向沉沦,迷茫恍惚的时间很短。我清楚地记得,在他26岁生日时,在张家口草原天路的微风中跑了一个26公里,此后以更昂扬和积极的状态站立起来,开始自己博士阶段的后半程。

也许是音乐在召唤,他再次回到最初的起点,重新回到音乐考古的研究道路上。人们都说音乐有独特的魅力和力量,能够在忧伤时给予慰藉,可以舒缓压力,是身心健康的守护者,还能培养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那之后,他正式开始博士论文的写作。个人的经历或许也让他对易逝而无常的声音,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用无声的文字、图像、器物来解读有声的音乐,他似乎找到了路径,对音乐史上的众多议题开始有了整体设想,找到了研究方向。

从这本书中不难看出,他跳出了以往以朝代为中心或以地域为中心的研究思路,把3—9世纪作为攻关时段,从墓葬与现实礼俗的互动、中外文化的交流、时代风尚与观念的形成等不同视角,全景式地呈现了中国中古时期音乐的发展与变迁。他还跳出了以往仅从表演的角度进行观察的窠臼,站在礼乐制度或礼乐文化的高度,着重讨论以汉唐为中心的中古时期,礼乐文化经历的重塑与转型。

考古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本书的特点。周



杨将看似纷繁而无序的音乐类文物,归纳为鼓吹乐、燕乐、百戏一类乐、高士雅音等不同类型,使不同属性的音乐文物变得有章可循。他提出了各类音乐组合的形成逻辑,不同类型组合出现、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契机与内在原因。当然,书中并未忽视对文献材料的细致梳理,结合相关记载归纳出音乐的不同功能,并将其与音乐文物建立起合理的关联。

如果说本书搭建了中古中国墓葬出土音乐文物的分类与研究框架,厘清了中古中国礼乐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那么书中提出了“墓葬礼乐符号”概念,并通过具体的案例加以阐释,由此归纳出中古时期礼乐文化发展的“雅俗关系”与“胡汉关系”两条线索,还讨论了在“声与政通”的观念之下,“礼制”与“礼俗”这两个相互影响的用乐传统,正是在上述两条线索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这些内容颇有独到见解和启发意义。由于大多数考古材料都有较为明确的年代和情境信息,这就大大增强了观点的可信度,同时辅以大量的考古材料图片,增加了本书的丰富性和可读性。

考古学面对的是零散的材料,从破碎中去勾勒并缀合成完整而具体的历史,似乎永远都会留下遗憾。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无声胜有声”,其中的“胜”并非划分高下之意,而是对这种客观现象的理解与自洽。换言之,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是否一定就是历史的真相?也许更多的真相藏在不可辨声音的背后。随着此类考古材料的增多、学科研究议题的扩展以及研究者知识结构的丰富,探索还会深入,不过这部系统讨论中古中国墓葬音乐文物的著作,大约可以说是该领域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这本书经历了长期的酝酿打磨,贯穿了周杨本科至今的学习、研究历程,也像一串跳动的音符,记录了他的生命体验。对于声音意义的不断求索,既是周杨对考古学研究更多可能性的探索与尝试,其实也是他认识自己的过程。

当这部书稿摆在我面前时,我想起了《列子·汤问》那个“高山流水”的故事,想到伯牙和钟子期,想到他们的知音之情。我见证了周杨本科、硕士与博士阶段的努力,仿佛又看到他在无声之中的徘徊与坚持,感受着各种声音对他的启发与熏陶。任何研究都不会有终点,就像攀登群山一样,研究者会不断地将自己重新融入更广阔的天地之中。如今他又在新的天地里开始探索,相信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演奏出新的乐章。

《无声胜有声:中古中国墓葬音乐文物与礼乐文化》

作者:周杨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读懂中华『左祖右社』传统都城理想范式

——评《太庙与中轴线古建筑文化经典》

弘博

的明清太庙的价值表现在哪里呢?第一,是崇高性。太庙具有五千年的传承史,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它位于国家和皇帝主政场所的中心、中轴的脉点,等级非常高。以屋顶为例,中国古代建筑屋顶的样式是分等级的,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攒尖顶……其中,庑殿顶是等级最高的,而故宫太和殿和太庙享殿采用的都是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顶。第二,是唯一性。太庙是我现存唯一的两个王朝共同使用的皇家祭祀建筑群,是中华民族祖先崇拜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北京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北京最具特色的人文景观。第三,是完整性。太庙是一个建筑群,不是一个单独的庙,而且是一个保存完整、功能齐全的建筑群。太庙位于紫禁城左前方,平面呈矩形,有三重琉璃墙,建筑格局完整,建筑保存完好。第四,是原真性。太庙的主体建筑都是明代建筑的原构,是明代官式建筑最经典的遗存。太庙主要建筑三大殿、戟门、东西配殿、神厨、神库、井亭、玉带桥、牺牲所等,主体建筑均为明代原构,体量之大为中轴线之最,蕴含着祭祀制度的完整理念和历史信息。与中轴线上其他古建筑相比较,太庙这种体量巨大且基本上为明朝原构的建筑,在中轴线上是绝无仅有、极为珍贵的。第五,是艺术性。建筑是无声的音乐。太庙在规划布局、建筑形态、建造技术、色彩运用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性,蕴含着“左祖右社”的古代都城营建规制。

本书的几个创新点也引人注目。首先是围绕太庙与中轴线文化遗产的现实解读。本书紧紧围绕中轴线中轴,对太庙祖先崇拜、礼乐文化的传承,对北京独特的古都地域文化和都城秩序进行了创新性的论证,研究成果为现实服务,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其次是通俗而又严谨。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力求资料丰富,论证严谨,在写



法上力求通俗易懂,注重趣味性。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和清晰的图片,对太庙“左祖右社”的空间关系、太庙与紫禁城的关系,太庙与“九坛八庙”的关系以及在轴线上遗存中的重要价值等进行了明确的分析解答。对太庙体现的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礼乐文化、建筑艺术、艺术审美等重点论述,很多观点填补了研究的空白,尽心竭力地向大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可读性强,引人入胜。

三是创新性解读“活态保护”。作者基于对太庙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思考,大胆地提出了太庙新功能以及更加合理深度利用的建议,从而为中轴线文化增添新的元素和生命原动力,是“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的探索,也为学术研究论著的范式提供了新的例证。

正因如此,本书得到了不少文博界专家的肯定和赞誉。本书序言作者、北京文物研究所原所长齐心认为,作者几十年如一日,即使退休了仍然锲而不舍地研究太庙文化,从祭祀到礼乐,从传承到创新,在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的基础上,孜孜不倦。这本书将在全球视野中,找到中华文化的地位,带领读者认知北京宏阔壮丽的景观特征,认知中轴线连续完整的空间序列,认知太庙传统核心文化的精神价值,认知首都北京多元文化载体的历史传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毛佩琦表示,祖先崇拜、尊礼尚乐是中华数千年的传统,太庙是可视可及的标志性文化遗产。凝结在太庙600多年时空里的价值元素,是五千年的文化凝聚、中华根脉,也是不绝如缕、泽被万代的制胜法宝,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太庙与中轴线古建筑文化经典》

编者:贾福林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